论“流氓无产阶级”及其在当代哲学语境中的嬗变

夏 莹 邢 冰

【摘 要】马克思对流氓无产阶级的评价主要是负面的,但后来的一些理论家如法农、马尔库塞等人,则看到了流氓无产阶级作为革命主体的可能性。这主要是因为,马克思的“无产阶级”概念并非实际存在的群体,而是一种主体性位置。随着具体情境的变化,流氓无产阶级也可能被用于填充这一位置。在当今的激进左派这里,这种观点基于一种拉康化的框架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巴迪欧的“事件位”“先将来时主体”、朗西埃的“无分之分”、齐泽克的“贫民窟”等理论,都将流氓无产阶级或边缘人群视为实在界的剩余,并认为其基于偶然性与异质性的原则,具有了突破象征秩序的潜力。但是,这样的思路存在着严重的问题,激进左派忽视了流氓无产阶级的流变性及其与资本的同构性,被其寄予厚望的流氓无产阶级可能摇身一变站在资本的一边。激进左派因而背离了马克思。

【关 键 词】流氓无产阶级;流氓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主体性位置;激进左派

【作者简介】夏莹,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邢冰,清华大学哲学系博士生(北京 100084)。

【原文出处】《探索与争鸣》(沪),2019.2.47~55

革命与革命主体,以至于一般意义上的主体性问题,是以“改变世界”为理论旨归的马克思主义与当代激进思潮所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法国大革命作为世界历史上最重要的革命之一,自然成为马克思主义与激进理论关注的焦点。即使是在革命话语退潮的当下,不甘于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激进思潮,也往往通过对法国大革命回溯性的指认,寻找突破资本主义的可能。但是,到了马克思开始活跃的19世纪40年代之后,轰轰烈烈的法国大革命最终却沦为第二帝国的“闹剧”。马克思对这段历史中流氓无产阶级所扮演的角色有着精彩的分析,而后世的思想家,尤其是当代激进左派对流氓无产阶级的不同理解,也反映了其在革命与主体性问题上的贡献与困境。

激进左派所处的情境与马克思的时代有很大的不同。在全球资本主义高奏凯歌的背景之下,基于哲学自身的发展,激进左派对革命主体问题有了进一步的理解。激进左派的贡献在于,切中了当下的具体的现状与问题意识。但是,激进左派对于流氓无产阶级不切实际的过高期望,将流氓无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相混淆而背离了马克思的原义。

流氓无产阶级的概念

“流氓无产阶级(lumpenproletariat)”的概念,最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被提及,在《共产党宣言》中有了相对明确的表述:“流氓无产阶级是旧社会最下层中消极腐化的部分,他们在一些地方也被无产阶级革命卷到运动里来,但是,由于他们的整个生活状况,他们更甘心于被人收买,去干反动的勾当。”①

马克思对于流氓无产阶级最集中的分析,是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这两部政论作品中。从1848年的二月革命到1851年路易·波拿巴上台这段时期,流氓无产阶级在历史舞台上异常活跃。这两部著作中的流氓无产阶级,相较于《共产党宣言》而言,有了更为丰富而深刻的内涵。

一方面,这两部著作中的“流氓无产阶级”的概念,继承了《共产党宣言》中的社会底层的地痞流氓、社会渣滓这一层含义。马克思指出:“流氓无产阶级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在所有大城市里都是由与工业无产阶级截然不同的一群人构成的。这是盗贼和各式各样罪犯滋生的土壤,是专靠社会餐桌上的残羹剩饭生活的分子、无固定职业的人、游民。"[2]流氓无产阶级往往是与无产阶级对立的,他们既是临时政府组织起来用来对付革命群众的别动队的主要组成部分,也是路易·波拿巴上台的核心阶级基础。

另一方面,马克思巧妙地利用"流氓无产阶级"这个概念,分析了上层阶级中与之极为相似的部分,包括七月王朝的统治者金融贵族,第二帝国的统治者波拿巴派,以及作为"流氓无产阶级首领"[3]的路易·波拿巴本人。为了与传统意义上的流氓无产阶级相区别,我们不妨将其称为"流氓资产阶级"。具体而言,金融贵族,或者说权贵资本,是权力与资本最无耻、最没有底线的结合。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指出,金融贵族操纵法律、政策、舆论,通过投机与欺骗来变现,"金融贵族……不过是流氓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社会上层的再生罢了"。[4]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波拿巴派也有类似的行径,"波拿巴派的流氓无产阶级是要发财致富的"[5],他们预先知道了出让铁路承租权的消息,在交易所进行投机获利。路易·波拿巴本人则是为了权力与利益无所不用其极的政客,既对资产阶级两面三刀,又通过欺骗、馈赠、贷款等手段诱骗法国人民。

流氓无产阶级具有两个基本特征:其一是赤贫的经济地位;其二是寄生性。寄生性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流氓无产阶级不进行劳动,也不创造价值。拉克劳认为,流氓无产阶级是"绝对的外在者"[6],是黑格尔意义上的"没有历史的人群"[7]。拉克劳的意思是说,马克思的历史是生产的历史,而流氓无产阶级并不参与生产的历史。另一方面,流氓无产阶级又高度依赖生产体系,通过巧取豪夺的方式占有他人的劳动成果。在"寄生性"这一点上,不仅是社会底层的小偷、诈骗犯、强盗,社会上层的金融贵族与路易·波拿巴这样的政客也是如此。"寄生性"正是流氓资产阶级之为流氓无产阶级在社会上层的再生的核心要素。

因此,从"寄生性"的视角来看,流氓无产阶级与福柯的"不正常的人"这样的被排斥者并不能完全等同。二者之间的区别就在于其与主流体系的关系。齐泽克认为,"相较于无产阶级,尽管流氓无产阶级看上去更彻底地'没有位置',但却更有效、更圆滑地适应了社会大厦"[8]。更精确地说,流氓无产阶级的寄生性决定了他们在生产环节处于体系之外,但在攫取利益之时高度依赖既有的体系。福柯的"不正常的人",无论是被排斥与隔离的麻风病人,抑或是被监视与规训的罪犯,他们既在肉体上被排斥在体系之外,又在概念上被定义为非人,在所有的环节都尽可能与主流体系相脱离。

需要指出的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对流氓无产阶级与流氓资产阶级的考察也越来越具有时代意义。资本主义目前已经发展到全球金融资本的时代,根据福柯在《生命政治的诞生》的说法,我们今天的世界是被经济学的权力/知识,尤其是20世纪60、70年代,以贝克尔为代表的美国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亦称"经济学帝国主义")所定义。在这种背景之下,金融贵族这样的流氓资产阶级在社会中也占据了一席之地。在今天,无论是在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在中国,都充斥着利用种种金融手段做多做空,或者与寻租权力合谋的损人利己的行径,甚至还有以金融概念包装的骗局。金融贵族这样的流氓资产阶级,在今日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影响力与危害,已远远超过了底层的流氓无产阶级。

此外,资本主义的发展为流氓无产阶级与流氓资产阶级提供了更丰富的寄生的资源与手段。事实上,二者的特质与资本主义是极为契合的。流氓无产阶级与流氓资产阶级是摇摆不定、没有原则、没有底线、无法预测的。他们唯一固定的诉求就是逐利,而这恰恰就是资本主义最重要的经济人假设。

流氓无产阶级的摇摆不定,在革命问题上体现为他们"能够作出轰轰烈烈的英雄业绩和狂热的自我牺牲,也能干出最卑鄙的强盗行径和最龌龊的卖身勾当"。[9]他们可能是革命的,更有可能是反动的。流氓无产阶级并非自觉的革命主体,但并非没有革命的可能性,这一特征就成为后世思想家为流氓无产阶级翻案的契机。

流氓无产阶级对主体性空位的填充

马克思对流氓无产阶级的评价主要是负面的,几乎没有提到流氓无产阶级成为革命主体的可能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性。较早讨论这种可能性的是毛泽东1925年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泽东认为,像三合会、哥老会这样的"游民无产者","是人类生活中最不安定者……很能勇敢奋斗,但有破坏性,如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10]毛泽东与马克思的思路实际上是一致的,但在当时的具体情境下,强调了流氓无产阶级可能的革命性。

另外一些思想家走得更远,如弗兰茨·法农。法农认为:"正是在这群众中,在这贫民窟的人民中,在流氓无产阶级的内部,起义将找到它在城市中的先锋队。流氓无产阶级形成了殖民地人民中最自发、最激进的革命力量之一。"[11]法农眼中的另一类革命主体是农民:"在殖民地国家,只有农民是革命者。他们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他们将获得一切。"[12]相应地,法农并不认可无产阶级的革命性,认为殖民地的无产阶级生活相对优渥,并且处于萌芽状态。

显然,法农对农民的评价效仿了《共产党宣言》中的著名表述:"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13]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所讨论的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内部产生并否定资本主义的力量,无产阶级作为"人的完全丧失"没有任何特殊性而获得普遍性的未来。对于法农来说,相较于殖民地的无产阶级,流氓无产阶级与农民,更接近马克思眼中的无产阶级。

事实上,马克思的"无产阶级"更多的是一个哲学概念,是在黑格尔式的辩证运动中,产生并内在于资本主义社会,而终将成为资本主义掘墓人的,走向下一阶段的中介。马克思的实践理想中,把黑格尔作为最终形态的"绝对"发展为"共产主义",从而回溯性地指认了"无产阶级"作为革命的主体。马克思的论敌巴枯宁曾批判马克思不能摆脱黑格尔式的形而上学抽象思维的支配,"不是从生活到思维,而是从思维到生活"。[14]应当承认,巴枯宁的这一观察有一定道理,但我们并不能赞同巴枯宁的立场。"无产阶级"作为哲学概念这一特征,非但不是马克思的理论缺陷,反倒是马克思的一个重要的理论贡献。正是基于无产阶级的概念,马克思才为我们提出了走出资本主义的可能性。

在这个问题上,齐泽克的说法更加清楚:"马克思区分了'工人阶级'(working class)与'无产阶级'(proletariat):'工人阶级'是特定的社会群体,而'无产阶级'是主体性位置。"[15]比如,马克思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所分析的法国的现实中外省的工人阶级并不是理想的无产阶级,它仍然比较弱小,"还没有能力实现自己的革命……在资产阶级旁边实现自己的利益,而不是把自己的利益提出来当作社会本身的革命利益"[16]。朗西埃也在《无产者之夜》等研究中表明,现实的工人阶级与理想的无产阶级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尽管如此,在马克思所处的特定时空条件当中,经验世界的工人阶级与承担主体性概念的无产阶级大体上仍然是同一的。因此,马克思以及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有时也对"工人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两个词不加区分地使用。

如果在齐泽克的框架下考察法农,就可以很清楚地发现,在法农所讨论的殖民地的现实状况下,工人阶级与无产阶级发生了重大的分裂。殖民地的情况比欧洲更加复杂,革命者需要同时面对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而相对优渥的经济状况与社会地位,以及相对匮乏的阶级意识,导致殖民地的工人阶级无法承担革命的主体性位置。因此,法农其实是用农民与流氓无产阶级填充了这一空位。

但是,工人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分裂,并不仅仅发生在被殖民地区等第三世界国家。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当中,更普遍的一种情形是,资本主义略施小恩小惠,使得工人阶级经济境遇改善,而摆脱了绝对贫困,并且,资本主义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等意识形态与商业宣传让工人阶级忘记了相对贫困。这样,工人阶级就不再具有马克思所说的"失去的只是锁链"的这种一无所有的普遍性的结构性地位,也没有了阶级意识,而无法承担主体性位置,革命的话语也开始式微。

这正是马尔库塞的思路。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中指出,在发达工业社会中,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融合为一个共同体,工人阶级"过着明显缺乏否定性的生活"[17]。在马尔库塞这里,"否定性"是指对当前社会状态的批判性向度,而工人阶级失去了否定性成为"单向度的人",也就失去了革命的主体性。到了《反革命与造反》中,马尔库塞对工人阶级的批评更加严厉:"在大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多数工人阶级的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不革命的,甚至是反革命的意识占着统治地位。"[18]马尔库塞也将希望寄托于生活在底层的流浪汉和局外人,不同种族、不同肤色的被剥削者和被迫害者,失业者和不能就业者。[19]简言之,是社会的边缘人群。虽然不能将其完全等同于流氓无产阶级,但是二者无疑有许多重合之处。马尔库塞认为,"即使他们的意识不是革命性的,他们的反对也是革命性的"。[20]这是因为,这些人群拒绝现存的资本主义秩序,因而仍然具有否定性与批判性的可能。

法农、马尔库塞等人,虽然用流氓无产阶级等群体填充了无产阶级的主体性位置,但其思路和马克思并不能完全等同。因为农民阶级与流氓无产阶级虽然一无所有,但是他们并不是资本主义内部所产生的,而是资本主义秩序之下的边缘阶级。马尔库塞自己就说,马克思的工人阶级具有三个特点:一是工人阶级本身就能使生产过程停顿下来;二是它占人民的大多数;三是就其整个存在而言,它是现存物的否定者。这三个特点使工人阶级成了潜在的革命主体。[21]马尔库塞本来是想说当今美国的工人阶级已不再具备这些特征,但是,我们可以反过来说,流氓无产阶级等群体,除了部分地符合第三点,同样不具备这些特征。

而仅仅依靠对现存制度的否定性,法农等人的理论,其实已经从马克思的内在运动走向了巴枯宁式的外在爆破。巴枯宁眼中的革命主体是"赤贫的无产阶级",认为他们"蕴藏着未来社会革命的全部智慧和全部力量"[22]。巴枯宁的思路是,因为这些人没有财产,因而具有强烈的破坏的热情,而破坏是革命的必要条件:"没有广泛的和剧烈的破坏,没有求生性和有效的破坏,就不会有新革命,因为正是从破坏中,而且只有通过破坏,才能孕育和产生新的世界。"[23]法农同样主张暴力的必要性,认为只有通过暴力,才能实现殖民地的解放。而我们接下来将要看到,这一思路在当代激进思潮中的发展及困境。

当代激进左翼思潮中的流氓无产阶级与"剩余"主体的困境

当代激进思潮在行动哲学上的核心特征之一,就在于融合了巴什拉、阿尔都塞、福柯以来的"断裂"思想。这种断裂观认为,思维与存在以及断裂前后的情境都是断裂的、不可通约的。这样,革命的目标就在于,创造一种当前的资本主义秩序的断裂,从而走向共产主义的未来。

在"断裂"的框架之下,当代激进左派的几位主要思想家,在主体性问题上都对被主流所排斥的边缘群体或流氓无产阶级有一种异乎寻常的关注。如巴迪欧的"事件位"与"先将来时主体"、朗西埃的"无分之分"、齐泽克的"贫民窟"等。事实上,对边缘群体的关注并不是从当代激进左派开始的。巴塔耶的"没有共同体之人的共同体",康吉兰的"正常与病态"的区分,已经从不同的角度开启了这一问题,到了福柯这里,经由对"疯人""罪犯""不正常的人"的系统的分析,指出其在权力/知识体系中,是被人为定义并通过不同的权力手段所排斥的对象。激进左派的突破主要在于,强化了边缘群体激进性、革命性的维度,将之视为潜在的革命主体。

阿兰·巴迪欧的事件哲学,就将这种"断裂"思想推到了极致。巴迪欧基于数学中的集合论构造了一个庞大的哲学体系。其中最核心的概念"事件",就被视为一种"历史性的中断"[24],而事件相应的数学规定 $e^x=\{x\in X, e^x\}$,在集合论中实际上是一个非法的公式,是一种类似于罗素悖论的不可能性的结构。因此,在先定情境中,事件是绝对不可能的。但事件真的发生了,并因而带来一个新的不同的情境。也就是说,事件造成了相对于先定情境的彻底的断裂与颠覆。显然,事件哲学在政治上的理论诉求,就在于为突破资本主义先定情境的革命寻求理论依据。

在事件承担者的问题上,巴迪欧首先设定了"事件位"作为在事件之先的、并且是事件发生的必要(但不充分)条件,事件位的元素在先定的情境中都不被呈现,比如全员都是黑户的家庭。这样的元素具有事件性的潜能。巴迪欧更重要的概念是先将来时主体,主体对事件之后所创造的新的情境有一种预先的认知,但是这种认识在原先的情境之中是没有内容的、是空无的。这也就是说,巴迪欧的主体试图从象征秩序内部指向不可能但却无比真实的实在。

雅克·朗西埃笔下的"无分之分"的逻辑也是类似的。朗西埃的理论诉求在于"政治"对"警治"的断裂。朗西埃认为,当代的政治形态与政治哲学是一种"警治(police,也译为治安)"。朗西埃认为,警治分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配了“可见与可说的秩序”[25]，即规定何者可见，何者不可见；何者可述，何者不可述。相应地，“政治”就是对“警治”逻辑的断裂，使不可见的变为可见，使不可述的变为可述。政治对警治断裂的关键就在于“无分之分(la part des sans part)”，即被警治秩序视为不存在的，因而是“空”“多余”的元素。政治的发生，就在于无分之分对于警治分配的破坏。无分之分因而就是当仁不让的革命主体。朗西埃认为“无分之分”正是马克思的“无产阶级”。

将“事件位”“无分之分”等边缘群体进行激进化的理论基础，在于一种对马克思的拉康化挪用。简言之，需要反对的资本主义秩序在结构上大致可理解为一种象征秩序。比如朗西埃就明确地说警治是“一种社会的象征性结构”[26]。而这种象征秩序总存在着一个结构性的威胁，即拉康的“剩余”“空无”或者是“外亲性”，即由象征秩序自身所导致的，象征秩序却无法容纳与理解的东西。齐泽克下述说法颇具代表性：“马克思此处实际上宣告了拉康对普遍性的看法：普遍性必有其例外……普遍性都必然带来一种特殊的‘外亲性’元素……削弱了普遍性的基础”。[27]这种空无，或者说实在界，是最真实的，它宣告了象征秩序的破缺，因而可能成为反对象征秩序的潜在力量。在实践层面上承担实在界的剩余角色的，就是被资本主义象征秩序所排除的，包括一些流氓无产阶级在内的，处于边缘、剩余地位的人群。基于这样的思路，对资本主义事件性的断裂得以可能。

这种拉康化挪用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斯拉沃热·齐泽克对笛卡尔“我思”的重构及“贫民窟”的提出。齐泽克在《神经质主体》中主张一种“笛卡尔主体”，但齐泽克的“我思”并不是“透明的思考主体”，而是它“被遗忘的另一面，即‘我思’之中那过剩的、不被承认的内核”[28]，这种主体是“鸿沟、缺口、空白”[29]。齐泽克进一步认为，这种笛卡尔主体可以导向一种解放性政治：“笛卡尔的空主体就是无产阶级，是沦为无实体的主体的空无之点的行动者。”[30]更具体地，齐泽克将“贫民窟”视为当代可能的无产阶级：“如果新兴无产阶级的立场就是新兴大都市贫民窟的居住者的立场呢？……贫民窟的许多特点与马克思主义对无产阶级革命主体所做的陈旧而准确的描述不谋而合。”[31]齐泽克认为，贫民窟即使不完全是革命主体，但至少是巴迪欧意义上的“事件位”，具有革命的潜能。齐泽克并不讳言，贫民窟与马克思笔下的流氓无产阶级的相似性。但齐泽克认为，在今天的全球资本主义条件下，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工人阶级无法承担无产阶级的使命，而贫民窟更加接近无产阶级的结构性位置。

需要指出的是，齐泽克的拉康化挪用有时是有些生硬的，而且也并不完全符合马克思的原意。因为，马克思的无产阶级是体系内部的力量，而激进左派的“剩余”革命主体游离于体系，为体系所不能容纳和理解。相较于黑格尔-马克思的内在的颠覆的革命逻辑，激进左派对断裂、剩余的强调，更接近法农、马尔库塞以来的巴枯宁式大破大立的外在性的爆破。当齐泽克说无产阶级是一种主体性位置的时候，他是对的。但当齐泽克通过拉康的框架去理解这种主体性位置之时，他无疑走得太远了。

更重要的是，这种思路虽然给出了断裂的可能性，但并没有能够成功地证明剩余或实在界相对于象征界的能动性。或者说，在这样的理论结构中，这种能动性是无法被证明的。因为象征界垄断了我们的全部知识，处于象征界之中的我们，不可能获得关于实在界的确切知识。我们自然也不可能知道或是证明，实在界之中是否存在确切的撕裂象征界的力量及作为其承担者的主体。因此，作为断裂的革命就成为不可预期的。正如巴迪欧对“事件”的态度：我们不可能知道事件何时发生，也无法促成其发生。主体的意义充其量只能是为事件的发生做准备，并待其发生之后，开创新的情境。

在传统哲学中，能动性往往通过诉诸意识层面而得到证明。具体在革命主体问题上，无产阶级的关键不仅在于其“失去的只是锁链”的结构性的社会与经济地位，也在于马克思已经开始思考并后来为卢卡奇所明确和发展的“阶级意识”概念。但是，当代法国哲学的核心取向之一，就在于不遗余力地解构传统意义上主体清晰、自决的意识。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询唤出主体”、福柯的“人之死”、拉康的“无意识主体”等理论，都从不同的角度证明了主体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的被动性。这也就是说,主体自以为清晰、自决的意识,实际上听命于一个更大的普遍性的东西,主体只不过是其结构性的后果。从这样的思路反观传统主体理论,就会发现传统主体同样在能动性与普遍性之间纠缠不清,而普遍性的形而上学则可能使主体成为派生的,反而消解了能动性,无论这种普遍性是理性还是历史。这就造成了主体性的两难,如果我们接受这种后果,自然没有什么能动性;反之,如果像当代哲学一样解构形而上学,也就同时解构了依赖于它的主体。上帝之死带来了人之死。

因此,唯一的希望,只在于不依赖任何东西的,不知自何而起的偶然性。因为偶然性可以允许一切的可能性。在象征秩序控制最薄弱的边缘,偶然性之下的一切可能性之中,说不定其中恰好有值得我们期待的未来。比如巴迪欧事件哲学中的先将来时主体,唯有在与事件性的真理的偶然相遇的轨迹之中,方可开创新的情境。这样一来,异质性就变得极为必要了。保持丰富的域外的异质性的意义就在于,提供尽可能多的偶然性带来的可能性。

但是,仅仅依赖偶然性与溢出,而缺乏更加确定性的东西所建立起来的主体性是极为脆弱的。这种脆弱性的来源之一,就在于权力与反抗潜在的同构。这种同构性可以从福柯在《求知意志》中所说的,权力与其反对者的复杂的关系来理解。福柯认为,"权力只有依靠大量的抵抗点才能存在"。[32]这就意味着,分散的、异质的、偶然的反抗,会成为权力本身进行扩张的策略的一个环节。权力可以因其否定的存在而被证明,也可以将否定的因素予以吸收。对于福柯来说,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权力/知识包括规训权力、生命政治以及作为其知识基础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福柯眼中的权力是微观的、分散的,而这恰恰与德勒兹所说的资本的流变性特征相契合。这样,基于偶然性、流变性进行抗争的主体性,就很容易为同样具有流变性的权力或资本所捕获。基于溢出的反抗,可能沦为齐泽克所说的"犬儒主义",即消解一切价值之后对资本主义随波逐流式的深层的共谋。

在权力与溢出的共谋的问题上,齐泽克自己的一个例证,恰恰回到了我们所讨论"流氓无产阶级"概念的原点,即路易·波拿巴上台的历史。齐泽克认为,权力的支撑恰恰就在于"溢出",正是朗西埃的"警治"权力所排除的"无分之分":"权力所'拒绝看见'的东西,与其说是被治安空间所排除的'人民'的(非)部分,不如说是权力自己的公共治安机制的那个看不见的支撑……所有的贵族统治,都必然带有隐藏的——被公然否认的——流氓无产阶级的支撑。"[33]路易·波拿巴正是"站在所有阶级之上,在所有阶级中游荡,直接依赖所有阶级的排拒物/残余"[34],而获得了溢出性的权力。

齐泽克的权力与反抗的逻辑在此呈现出惊人的同构。这个例证不仅消解了朗西埃基于"无分之分"的革命性"政治",也消解了齐泽克自己对"贫民窟"的判断。齐泽克的贫民窟既被视为革命的潜力,也被视为权力的基础。这恰恰印证了最初马克思对流氓无产阶级的判断。也正因为如此,经验世界的真正的"剩余"人群,与激进左派在概念上所规定的理想的革命主体相去甚远,其差别更是远远超过了齐泽克所说的工人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差别。偶然性将主体从必然性之中解放出来,但也使主体没有了方向。我们利用偶然性与过去决裂,使未来的一切都似乎成为开放的。但是,流氓无产阶级就在这个时候乘虚而入。因为流氓无产阶级恰恰是具有高度偶然性的、没有原则的、难以预测的存在。边缘人群进入资本主义的秩序之后,大多在资本的逻辑之下,成为流氓无产阶级,而站在资本主义的一边。如果他们因此获得了巨大的利益,便会转变为流氓资产阶级。我们可以轻易地举出很多这样的例子,比如黑客群体。虽然齐泽克将阿桑奇视为反对全球资本主义的希拉里共识的英雄,但黑客所做的更多的是诸如勒索病毒、攻击比特币交易所并利用金融手段套利等行径。赤贫者、恐怖分子这些群体,同样有类似的情况。

因此,我们不可能仅仅依靠"剩余"这一个特征建立主体性。对于"剩余"人群,其偶然性的特质和流氓无产阶级过于相似,我们有必要具体鉴别出其中真正具有革命性与主体性的要素。这样一来,革命主体的分布就会极为零散。这种分散的主体性在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福柯的“生存美学”与德勒兹的“游牧”的层面上是有意义的，但这种游击式的主体性，很难对兼具一元论的总体性与流变的灵活性的资本主义体系造成有效的破坏。

流氓无产阶级的破坏性维度还体现在后革命的问题上。基于偶然性、断裂、溢出的革命，即使它真的成功了，革命的未来同样是不确定的。因为我们很难指望断裂之后的一个对我们来说是随机的新情境，恰好符合我们的预期。比如，在巴迪欧“事件”理论中，基督降临、十月革命、法国大革命都被视为事件，相应的主体是圣保罗、列宁和山岳派。但我们知道，圣保罗之后是十字军、列宁之后是斯大林、山岳派之后是路易·波拿巴，而利用了流氓无产阶级上台的路易·波拿巴，并不能说比波旁王朝更加进步。这样的革命只不过是一种仍然需要被打倒的新秩序代替了已被打倒的旧秩序。

总结

当代激进左派对流氓无产阶级过高的期许背后，实际上有着一个在革命与主体性问题上的范式转换。激进左派认为，在马克思的时代，推翻资本主义建立共产主义的革命的目标与行动的方针比较清晰，主体性因而指向相对明确的未来。但是，随着革命话语的退潮与当代哲学对宏大叙事的解构，激进左派的建构性的理论也屡屡受挫。激进左派对马克思所开创的改变世界的思想路径的坚持，因而主要转向了否定性的维度。虽然今天的激进左派往往被诟病为仅有一种激进的姿态，但这种激进的姿态已经是激进左派沿着马克思的路径走到今天所争取到的最大的理论成果，从而防止人类彻底被资本主义吞噬，为人类的解放保留了可能。永恒的剩余与断裂，正是这种否定性的激进姿态的理论基础。这样，变动不居的边缘主体，或者说流氓无产阶级，就成为这种激进姿态域外的主体性的承担者。

当今激进思潮的主要问题其实在于，对流氓无产阶级是否具有批判性、否定性的意义缺乏甄别，将流氓无产阶级的革命性理想化，将之简单地等同于无产阶级，背离了马克思对无产阶级和流氓无产阶级的区分。如果说激进哲学未来在主体性问题上希求有所推进，可能的方向在于，在同质性、普遍性的意识被消解的今天，至少在批判性的意义上重建一种异质性阶级意识；进一步地，有可能的话，寻求这样的异质性的阶级意识的团结的可能性。

注释：

①⑬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8页、65页。

②④⑨⑯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42页、29页、38页、34—35页。

③⑤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64页、119页。

⑥Ernesto Laclau, *On Populist Reason*, NY: Verso, 2005, p. 144.

⑦Ernesto Laclau, Why Constructing a People Is the Main Task of Radical Politics. *Critical Inquiry*. Vol. 32, no. 4(2006), p. 667.

⑧⑮Slavoj Zizek, Against the Populist Temptation. *Critical Inquiry*, vol. 32, no3(2006), p. 565, 564.

⑩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9页。

⑪⑫Frantz Fanon, *Les damnes delaterre*, Paris: Éditions La Découverte & Syros, 2002, p.125, 61.

⑭㉒㉓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马骧聪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162页、8页、34页。

⑰⑲⑳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第23页、202页、202—203页。

⑱㉑H.马尔库塞等：《工业社会和新左派》，任立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84页、110页。

㉔Alain Badiou, *L'être et l'évènement*, Paris: Seuil, 1988, p.375.

㉕雅克·朗西埃，《歧义：政治与哲学》，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48页。

㉖雅克·朗西埃：《政治的边缘》，姜宇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第129页。

㉗㉘㉙㉝斯拉维·纪杰克：《神经质主体》，万毓泽译，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第251—252页、2页、222页、332—333页。

㉚Slavoj Žižek, The Varieties of Surplus. *Problemi International*, vol. 1, no. 1(2017), p.25.

㉛㉞斯拉沃热·齐泽克：《视差之见》，季广茂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423—433页、529页。

㉜米歇尔·福柯：《性经验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62页。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